

南中国文丛

学思闻道

易文翔 著

广东省文艺研究所 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南中国文丛

学思闻道

易文翔 著

广东省文艺研究所 编

SPM

南方蓝瓶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学思闻道 / 易文翔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6

(南中国文丛)

ISBN 978-7-5360-7178-0

I. ①学… II. ①易…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研究—
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2924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许泽红
技术编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刘 言

书 名	学思闻道 XUESIWENDA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5.5 1插页
字 数	240,000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写在前面的话

若非陈川泓所长提议，也许我到现在还不会想到出这本书。如果说成就某件事需要机缘，那么陈所就是这本书的布缘人。感谢她让我有机会将散见的文章归纳整理，通过这些文字“重返20岁”。

这本文集收录了十几年来我所写的一些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在大学时写作完成的。翻检这些旧文，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彼时的我，怀着对“学问”的崇敬、对未来的憧憬，在书海中探寻，在纸与笔的摩擦中跃跃欲试。

眼前浮现出那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凭着在报刊上发表的大小“豆腐块”获得了院系老师的肯定，竟然拿到了“闻一多文学奖”一等奖。当时的评委老师都是系里的名师，其教学主要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较少给本科生上课，老师与学生并不认识。老师因为文章记住了我的名字，而我们认识则已经是撰写毕业论文之时了，聊及此事，双方皆感叹为一件乐事。

时间跳跃至刚刚步入研究生阶段，我接到的第一个课题任务是撰写三万字的作家专论。此前写文章从未过万字的我突然面对如此大的“工程”，一时间感觉“压力山大”，于是废寝忘食、笔耕不辍，就这样突破了字数的“瓶颈”。

过去的时光快速在脑海中闪过：

讨论课上，我的发言引发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导师组成员的思想交锋却让我厘清了思路，后来写成的文章不仅顺利发表，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因此同学们笑言：不怕老师批评，就怕老师无语。

想起了在当年，一台几千块的电脑，对于每个月只有一两百元生活津贴的学生而言，是奢侈品，为了将写在纸上的文字数字化，一开始只能找打印店录入，后来随着文字量越来越大，录入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不得不考虑拥有自己的电脑，于是一台由报废电脑部件组装而成的电脑诞生了，也让我这个文科生变成了“技术控”。

也想起了个中的艰苦，还有不合时宜的坚持。

.....

兜兜转转，我又回到了当初想走的道路上，因此有了这本书的面世。如今看来，其中的文字不免有略显稚嫩之处，但从字里行间，却有着一种特别的感受，就像回看儿时的绘画，虽然幼稚，却饱含“理想”与“阳光”，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纯粹，没有日后在职场遇到的种种，比如发言稿被人全文剽窃，且有意安排在我前面发言，直到会场听到发言我才发现这一切，然而已是既成事实。面对此类事情，我有的时候便是以记忆的“纯粹”去吹散负能量的“雾霾”。

当年欲“致知”而“学思”，为“悟道”先“闻道”，这本书让我记起学思、闻道的初心，正视“问道”之路，为了将来不至于“白首无成”。

以此致我的青春。

2015 年 3 月

Contents

目录

文学研究_____ 003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011 狂欢背后的孤独

017 救亡语境下的历史误读

024 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捩点：初期抗战文学（节选）

084 执着于梦幻世界的突围与表演

094 历史与人生的诗化寓言

103 智者入世的游戏

113 近五年中短篇小说创作述评

118 当代小说中的少儿视角（节选）

143 董宏猷儿童小说创作道路初探

对话作家_____ 157 灵魂世界的探寻者

165 写作：忠实于内心的表达

175 坚持自我的写作

传媒视界	第十位缪斯的使者	185
	罗伯特·吉鲁：艺术收藏家般的编辑	194
	消费语境下的中国时尚杂志	202
	“无纸化”：出版业发展的新空间	208
现象聚焦	追风筝的一代人	213
	国产“高概念”电影：喧嚣背后的苍白	220
	翻译出版界重译滥译之风当止	225
	文学评优应有读者意识	229
学术翻译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性问题	233

文学研究

WENXUEYANJIU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从《新青年》杂志以“民主”“科学”“启蒙”的旗帜联合新一代知识分子，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同人杂志便成为文艺工作者联合“同志者”的主要阵地。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现代知识分子严重分化，所办刊物尤其纯文艺杂志，多趋同人杂志。这种同人杂志一方面体现出自己流派的风格，但另一方面，它又排斥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多样性的追求相悖。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有一份杂志试图纠正这种倾向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就是1932年5月1日诞生的《现代》杂志。将《现代》与当时其他的文艺刊物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在它那里看不到鲜明的派别意识、阶级意识。既有海派文人（如张资平、叶灵凤等）以及新感觉派作家（如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的创作，也有京派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的文章，还有老舍、巴金等民主作家的作品；既有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左联”作家的论文，也有韩侍桁等“中间派”以及胡秋原这种“自由人”的言论。在文艺理论方面，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也有《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在创作上，《公墓》《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这类现代主义作品很多，《春蚕》（茅盾）、《丰年》（张天翼）这种现实主义之作也不少。可见，《现代》杂志发表的文学作品是多元并进、交融互补的，它为现代文学史以及杂志编辑史提供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现代》出现的时候正是上海迈入现代化都市之初。20世纪20年代末30

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上海以其经济、政治、文化优势确立了文化中心地位。政治氛围相对宽松、言论出版相对自由、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新闻出版产业……这些都使得上海对文人志士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各路文豪、知识精英趋之若鹜。1927年1月，郁达夫回到上海；10月3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1930年5月，丁玲、胡也频由济南南下上海；1931年，穆木天、周扬、冯雪峰等人相继到达上海。此外，北京的徐志摩、丁西林、闻一多、饶子离、饶孟侃、沈从文，从北伐前线退回的郭沫若、茅盾、蒋光慈、阿英、孟超，日本留学归国的沈端先、李初梨、成仿吾，东北的萧军、端木蕻良，四川的沙汀、艾芜，湖南的叶紫……都在此期间集结上海，再加上原本就在上海的文艺家，上海文坛真可谓群英荟萃。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样式共存于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争芳斗艳，为《现代》杂志“海纳百川”提供了可能。

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由北往南长驱直入，1932年1月28日，战火燃烧到上海，上海东方图书馆在炮火中被摧毁，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小说月报》停刊，上海大多数的文艺杂志受损。在这样的文化虚空中，《现代》这种大型文艺刊物的出现正是恰逢其时。它为人们，尤其是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发表言论的阵地。同时，淞沪战争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侵略者。左翼作家与非左翼的民主派、中间派作家在斗争意识中找到了一致的地方。这种共识包孕着后来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在“左联”内部，瞿秋白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改变初期坚硬策略，破除了“左联”作家不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禁忌，充分利用各种刊物宣传自己的主张。《现代》杂志便是在这种共识的背景下诞生的。

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来看，现代文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具备开放性特征。《新青年》对国外文学的引进，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在提倡为人生与写实主义的同时对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的介绍，都说明新文学的兼容并蓄。门户之间壁垒森严的倾向是在20年代中后期新文学从幼稚走向成熟、流派风格相对稳定的时候出现的。这种门户之见违背新文学传统，不利于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文学自身的调节决定30年代的文学对这种现状进行反拨，各种创作手法交融，如艾青的诗歌就是现实主义与象征的结合。各个流

派之间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如1931年3月16日发刊的《文艺新闻》，其初衷是：“不拘于某一种主义；不依附于某一种的集团；不专为任何的个人或流派；不专为特定作用的任何事象；凡是属于大众的，为大众所需要的，——有文艺新闻价值的一切，皆为《文艺新闻》工作的对象。”^[1]这一主张与《现代》杂志的编辑方针可谓不谋而合。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文学传统的回归。

对于《现代》来说，也许书局老板的出版动机和主编的编辑方针是它具有“海纳百川”之气概的最重要、最为具体的因素。现代书局曾发行《拓荒者》《大众文艺》等左翼文艺刊物，因遭当局所禁停刊，后来迫于官方压力办《前锋》，反响并不好，终于在炮火中消散。经过这些波折，淞沪战争后的现代书局决定办一个没有政治倾向的刊物，以便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当时的施蛰存既不属于左翼作家，又与国民党没有关系，立场中立，而且他曾办过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和《樱珞》《无轨电车》等杂志，在编辑文艺刊物方面颇富经验，这些恰好符合现代书局的条件，于是书局的老板洪雪帆、张静庐就选择了他担当主编的职务。在《现代》的编辑过程中，第一、第二卷虽为施蛰存主编，但杜衡、戴望舒也参加了编务工作。第三卷开始杜衡与施蛰存联名主编，一直到第六卷第一期。1935年，现代书局被徐朗西掌管，第六卷第二期主编改为汪馥泉，《现代》由文学杂志变成综合性文化杂志，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第一卷到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杂志。施蛰存在编辑《现代》时，努力把它办成没有政治倾向的文艺杂志，他在创刊宣言中说：

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

本志是普通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流派。

.....^[2]

从这几句话中，基本可以确定《现代》的性质。“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是指与此前的《新青年》那样集团利益鲜明的杂志不同，其中隐含的广义的“同人”实际上是指广大文艺工作者。

正因为这些原因，《现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现代》杂志首先是它的“现代性”。在创刊号的“编辑座谈”中，施蛰存写道：“这个月刊既然定名为‘现代’，则在外国文学之介绍这一方面，我想也努力使它名副其实。我希望每一期的杂志能给读者介绍一些外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从这一期开始，《现代》每期至少有两篇外国作家的作品，介绍更是不胜枚举。在此之前，也有不少杂志介绍外国文学，《现代》与之不同的是，对于以往所重视的20世纪以前的文学家多以纪念的方式予以介绍，如“司各特百年祭特辑”“歌德逝世百年纪念画报”“左拉逝世三十年祭”等。它重点介绍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家的文学作品，如《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一九三二年的欧美文坛》《英美新兴诗派》等。1934年9月第五卷第五期宣布：“现代杂志拟自第五卷起每卷刊行介绍现代世界文学之专号一册，以国界为别，先出美国，再就法国、苏联、英国……”第六期便推出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介绍杰克·伦敦、德莱塞、海明威、福克纳、欧·亨利等“当前”作家及其作品。可见，《现代》杂志的“现代”有时间上的“现时性”，借用海德格尔的话，《现代》杂志关注的是“此在”的文学。与此相应，对中国文坛的注重也在于“现代”，关注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作家。因此，在第一卷第六期的编辑座谈中，施蛰存说：“在纷纷不绝的来稿中，我近来读到许多——真是惊人的多——应用古事题材的小说，意象派似的诗。”对此他表示，“不愿意《现代》的撰稿者尽是这一方面的作者”，并再次声明，“我编《现代》，从头就声明过，决不想以《现代》变成我底作品型式的杂志。我要《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这是我的私愿。”因此，《现代》追求的是现代作家的会合。由这种追求带来的就是“开放性”，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凝聚撰稿人。《现代》第一卷是“集合”的开始，除了海派作家作品，还汇集了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张天翼等非海派作家，并对《她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三人行》（茅盾）、《桥》（废名）、《田野的风》（蒋光慈）、《复仇》（巴金）等小说进行评论。1932年11月，针对第一卷现代主义作品居多的缺

陷，施蛰存将第二卷第一期做成“创作增大号”，增加小说、诗歌的分量，并把叶圣陶的《秋》放在首篇。在茅盾《春蚕》、郁达夫《东梓关》、鲁彦《胖子》、巴金《电椅》、张天翼《仇恨》这些左翼、民主作家小说之后才是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以及其他海派作家作品；唯一的戏剧作品刊登的是《同住的三家人》（欧阳予倩）这一现实主义剧本。这一期添印了两版，一共卖了一万册^[2]。这一期真正实现了现代作家的集合。在第一卷中，《现代》介绍的作家几乎全是国外的作家，从第二卷第一期开始介绍我们自己的作家，先后登出郁达夫、李金发、周作人、老舍、戴望舒、穆时英、叶灵凤、鲁迅等当时文坛俊杰的照片，并关注作家的动态，如“送戴望舒去法国”“鲁迅在北京”等。《现代》的撰稿人，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郭沫若、李金发、钱杏邨、叶紫、夏衍、丁玲、何其芳、彭家煌、臧克家、李健吾、靳以、王统照、师陀、陈白尘、郑伯奇、沙汀、白薇、丰子恺、赵家璧、钟敬文、朱湘、苏雪林，等等。在30年代，很难再找出像《现代》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名作家阵容的杂志。

正由于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体现出“自由”的精神。这便形成它的第二个特点：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在1933年5月第三卷第一期的《社中座谈》中，施蛰存提出，增加“随笔·感想·漫谈”栏目的目的，是“要使这纯文艺的杂志的作者与读者能够有机会自由地——那即是说，不为体例所限地，有一个发表一点对于文艺与生活各方面的杂感的场合”（着重号为原文所有）^{[3]255}。在这里，虽然施蛰存突出的是发表的内容，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提出了“自由”。正因为如此，杂志本身对于文艺上的论争并不作是非判断。杜衡参与主编后，仍然按照这种方针进行编辑。例如，在当年争论最为激烈的“第三种人”论争中，由苏汶（杜衡）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发起，瞿秋白、周扬、胡秋原、冯雪峰、鲁迅等人都参与了论争。在论辩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文章都是先经过对方看过，再送到施蛰存那里。

鲁迅先生的《论“第三种人”》是苏汶看过后并由苏汶转交给施蛰存的^{[3]230}。可见，《现代》杂志采取的是一种“中间”立场。同时，也因为这种“中间”立场，决定了《现代》不会成为当局的传声筒，而对事实会作出公

正的报道。如柔石等人遇害后，鲁迅先生为此写就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作为首篇发表在1933年4月《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上，文后附有柔石留影及手迹，并刊载了鲁迅先生为纪念柔石所选的德国珂勒维支木刻《牺牲》。这幅木刻曾在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首页刊登过，其意义在“编后”已有说明。《现代》再次刊出，强化了这种意义^①。再如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捕后，上海的各大报刊对此保持沉默，《现代》却将此事公开，并于7月的第三卷第三期刊登“话题中之丁玲女士”一组四张照片，含蓄地表达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也许正因为这种姿态触动了政府敏感的神经，才会有1935年政府派专员对《现代》进行“改革”，于是这份纯文艺刊物也就走到了尽头。

《现代》杂志的“开放”与“自由”给它带来了民主的色彩。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民主色彩是源于出版者商业目的的功利主义。从一开始，书局老板选择施蛰存担当主编就是基于此心，后来决定让杜衡与施蛰存联名主编，也是因为担心杜衡被其他书局“挖走”而削弱自己的实力。以商业利润为指针，这是《现代》与左翼文学杂志最大的不同。所以，《现代》不计流派之间的龃龉，广纳文稿，尤其重视采用名人的稿件，利用人们对名人的爱慕、崇敬之心来增加杂志的魅力，提高知名度，从而促进杂志的销售。例如，上文提到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先生开始并没有打算将它送给《现代》，由此，我们可以揣测，也许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现代》并不一定是不带政治偏见的杂志，至少不是“正义呼声”的首选。这篇文章在两个杂志编辑室里搁了几天，都不敢采用，才转到施蛰存那里。施蛰存拿到后，也踌躇不决，交给老板张静庐定夺。张静庐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3]219}从张静庐的第一个理由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待鲁迅先生这种“文坛旗帜人物”的稿件，张静庐显示了其独到的眼光和一定的

① 尽管施蛰存不承认《现代》载《牺牲》有这种意义（见《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载《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出版社，1996），但笔者以为，文章与木刻同时刊出，不一定是巧合。

胆识，这就是《现代》的魄力；同时也可以看出《现代》采用鲁迅先生的文章较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正是这种基于商业目的的“名人效应”追求以及施蛰存的编辑原则，使《现代》在操作上客观地促进了文学多元的发展。

张静庐的第二个理由透露另一种信息，即当局对新闻出版的 control。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统一全国不久，对政治色彩鲜明的出版物毫不放松，1929 年颁布的有关法令就有《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便》《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等，对“左联”的刊物更是防范有加，《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存在时间都很短，前文提到的《文艺新闻》自从楼适夷参与主编，显露“左翼”色彩，马上就被政府所禁。但当局对中间色彩的报刊还存有一定的容忍。《现代》便是凭借着它的“中间”色彩在上海立足，即使如此，在政治问题上仍不免有如履薄冰之感。这便是施蛰存、张静庐二人犹豫的原因所在。同时，当时代表时代潮流的无疑是左翼文学。作为关注当下文坛的《现代》杂志不可能对此漠然视之。《现代》便是斡旋于左翼文学与政府御用文学之间，在二者的夹缝中竭力保持自己的“无偏党”超然独立地位。这就使得《现代》会放弃一些对时政的关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纯文艺”上面（这与现代诗派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如 1933 年 11 月第四卷第一期的《四卷狂大号告读者》中指出，将“随笔·感想·漫谈”一栏废去，改为“文艺独白”，“意思就是把杂论的范围仍然限制到纯文艺方面来”。这种做法显然是对敏感问题的规避，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这种独立往往带来的是隔膜，因此编者常常会感到一种“孤独”。1934 年 7 月第五卷第三期选登的洛克威尔·肯特的木刻《孤舟》，图中一人驾驶着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漂泊，既可看作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又可视为面对潮流“孤独”心境的写照，无疑暗示着主编的心情。此时的《现代》因为对“第三种人”的暧昧态度，失去了一部分作家，尤其左翼作家，如此一来它也就再难实现现代作家的“大汇合”了。

《现代》努力促进文学多元的发展，并追求文学的“现代性”，这是符合文学的自身发展规律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文艺观中有超前意识。然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民族矛盾激化和阶级冲突的白热化，使得文学不能仅仅关注自身的发展，而更多地承载阶级

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现代》的政治意识则滞后于时代。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政治意识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文学的偏移,尤其出于对某种社会目标推进的急切动机而实行的急功近利的设计、倡导等非文学因子对文学的逼迫与吞噬,使文学离自身愈来愈远。在这一点上,《现代》作为一个“异数”,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正是《现代》这类杂志的存在,才向后人昭示了30年代上海文坛的多样与繁华,它为现代文学各种样式的发展提供了公共空间,这是一个文学的多维空间,一个与世界文学连接的“接口”。

回望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现代》无疑是当时最具影响的纯文艺刊物,现代作家的“大本营”。在30年代的上海文坛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时,《现代》杂志为这种繁荣景象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它那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所体现的现代风度,使以《现代》为阵营的海派比京派具备更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现代”意义在它那里普泛化,同时,这种开放性对文学的单纯政治化走向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原文载于《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2002年第9期全文转载)

参考文献:

- [1] 袁殊.《文艺新闻》之发刊[J].文艺新闻,1931,(1).
- [2] 施蛰存.《现代》创刊宣言[J].现代,1932,(1).
- [3] 陈子善,徐如麒.施蛰存七十年文选[G].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